▲暇观亭书话

慕莱堂上生春风

张东吾

最近,乡友周伟文兄出了一部怀念父亲的诗歌专集《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也有春天》。伟文兄诗写得好,人做得更好,尤其是孝道可嘉。他在父亲去世前后六年中,创作怀念父亲的诗歌180余首,其中诗集收录150首。

由此我想到了家乡的另一位以诗出名的先贤李艺渊。李艺渊,本名李维翰,又名李艺垣、李艺园,新邵严塘人,举人出身,早年授宁乡训导,后弃笔从戎,以军功升任江西临江知府等职。李艺渊是一个颇有诗名的人,不过他的诗名与别人来得不一样,不是因为他的诗写得有多好,而是因为他编过一部有名的诗集《慕莱堂诗文征存》。而《慕莱堂诗文征存》与别的诗文集又不太一样,几乎全是征集来的诗文作品,而且也和伟文兄的诗集一样,是一部孝文化题材的诗文集。

1884年,时任临江知府的李艺渊思亲心切,在当地盖了一座房子,取名"慕莱堂",将古稀之年的父母从湖南接到身边,并效仿老莱子为父母"斑衣戏彩"的故事,为母亲举办了七十大寿庆典。其时高朋满座,纷纷吟诗作赋,以纪其事。在收到同年好友王凤池的诗作后,李艺渊曾写过一首唱和诗:"堂上双增健,晨昏久未亲。馆留丛桂客,瓮熟早梅春。鹤俸分何薄,鸾章宠更新。欣逢文母寿,锡类遍凡民。平日倚闾切,高年行路难。眠餐幸无恙,眷恋不遑安。且效斑衣舞,何殊画锦观。高轩劳见过,觞咏耀衣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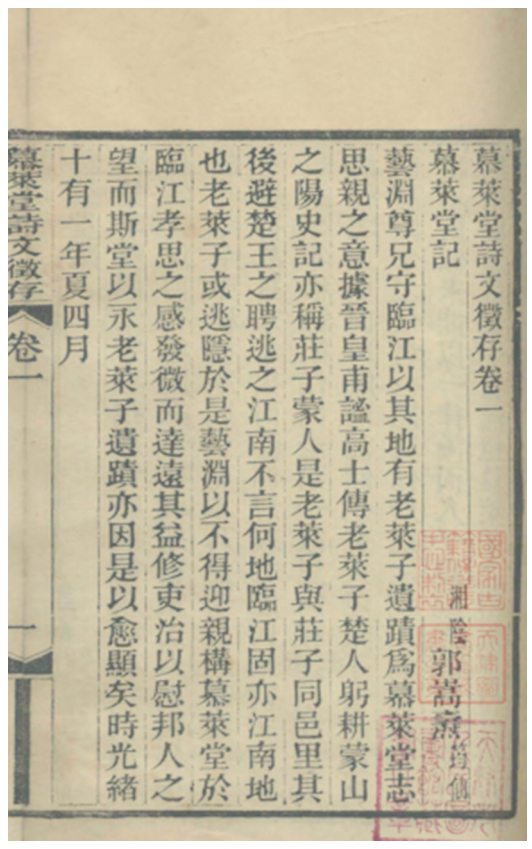
第二年初夏,李艺渊请郭嵩焘为慕莱堂题了额,作了记。郭嵩焘在1885年4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说:"李艺垣守清江,署其堂曰慕莱,以清江为老莱子故里……而艺垣用其思亲之意,寓官于此,殆亦望云亲舍之意也。"李艺垣即李艺渊,而清江是临江府城所在地,代指临江。

李艺渊在父母去世守丧期满后,又先后出任江西南康知府、湖南盐务督销局局长、安徽皖南茶厘总局局长、江苏道员等职。刘坤一曾于1898年12月在《特保贤明人才折》中保举过他:"又江苏试用道李维翰,局度严整,才具优长。先在江西,署南康府事,颇有政声。及来江南,历办湖南盐务、皖南茶厘,认真整顿,均有起色。凡有益于地方之事亦复孜孜为之。"

李艺渊在忙于政务之余,将"慕莱堂"额及诸题咏遍寄同僚和好友,索题诗文。后因辗转多地任职,担心诗文遗失,他便将收到的诗文整理成卷,汇成《慕莱堂诗文征存》,有5卷本、6卷本、10卷本、11卷本、12卷本等多种版本存世。从《慕莱堂诗文征存》的内容来看,刘坤一、谭钟麟、陈宝箴、俞廉三、德馨等满汉督抚大员,王闿运、邓辅伦、王先谦、吴德襄、肖光南等当时国内名士,均为之或作诗,或撰文,其中甚至有朝鲜进士赵玉坡、鉴湖女侠秋瑾、八指头陀的唱和诗文。而《慕莱堂诗文征存》书名则由时任两江总督曾国荃题写。可见李艺渊的朋友圈有多豪华。

试想一下,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高官名流愿意为李艺渊站台呢?我想,除了李艺渊的人格魅力之外,更重要的恐怕是其中蕴含的孝道精神吧。"老莱娱亲"是著名的二十四孝之一。老莱子是楚国人,以才孝双全著称,七十多岁时,为了使老父母快乐,他还经常穿着彩衣,作婴儿的动作,以取悦双亲。"动天之德莫大于孝。"孝道之心,人人有之,这些高官名流们在为慕莱堂题写诗文时,或许也在表达他们自己对父母的孝心,对祖先的礼敬,对孝道的弘扬呢。

在李艺渊生活的时代,尽孝道并不容易。刘坤一贵为两江总督,因忙于征战和公务,竟然十八年没有回家省过亲。李艺渊在任临江知府前整整十年没有回家省过亲。在这些为"慕莱堂"题写诗文的高官名流中,又有多少虽有拳拳孝心却不能将父母奉养在身边,或者长年无法省亲的人。李艺渊为"慕莱堂"征集诗文的举动,无疑会触发他们敏感的神经,触发他们干涸的泪腺,触发他们柔软的内心。


慕莱堂詩文徵存 卷一
慕莱堂記
藝淵尊兄守臨江以其地有老萊子遺蹟爲慕萊堂志思親之意據晉皇甫謐高士傳老萊子楚人躬耕蒙山之陽史記亦稱莊子蒙人是老萊子與莊子同邑里其後避楚王之聘逃之江南不言何地臨江固亦江南地也老萊子或逃隱於是藝淵以不得迎親構慕萊堂於臨江孝思之感發微而達遠其益修吏治以慰邦人之望而斯堂以永老萊子遺蹟亦因是以愈顯矣時光緒十有一年夏四月
郭嵩燾

一百多年过去,李艺渊在临江的慕莱堂早已不存。而在李艺渊的家乡,至今仍保留着他的故居。李艺渊的故居位于白水洞村,这里群山环抱,瀑布高悬,溪流蜿蜒,风光秀丽,风俗淳朴。置身此间,油然生出"安得居其中,饱享神仙福"的感慨。可惜的是,对于李艺渊在家乡的这座"慕莱堂",因年久失修,虽然仍不失高门大户的气势,但早已破败不堪,风雨飘摇。

从老莱子到李艺渊再到周伟文,从《二十四孝图》到《慕莱堂诗文征存》再到《另一个世界的父亲也有春天》,虽然世易时移,但在楚湘大地,感念亲恩、力行孝道的心却从不曾移易。

(张东吾,新邵县人,其作品入选《邵阳文库》《芙蓉花开》《芙蓉国》《原上草》等多种选本)

▲文本细读

多情绿衣女

安宁

《聊斋志异》中的绿衣女,仅仅看名字,就是一个极易让人产生想象的妙称。夜色之下,一个着绿色长裙的女子,穿越山林,为醴泉寺里飘摇昏黄的灯下勤奋读书的益都书生,送去深山中的一抹温情。

这只绿蜂幻化而成的女子,想来早已在寺中守候许久,只是她见到的多是苟且偷生之辈,在古寺中栖息,尚不忘利禄功名,甚至为蝇头小利而躁动不安,辗转难眠。她从窗前飞过,看如此庸碌之人们,未曾动过丝毫凡心。也因此,当书生于景夜(编者按:夜三更时)起来读书时,她才会忍不住,停驻在月光微凉的窗前,赞一声:于相公勤读哉!

书生知道这样一个婉妙无比的深山女子,必定不是常人,但却无法阻挡她微笑娇嗔一句:"君视妾当非能咋噬者,何劳穷问?"其实书生在绿衣女推门笑入的时候,心内便已经起了波澜,所以即便是良宵过后,有被她噬掉的危险,他也顾及不得。因为,这样一个长夜中可以红袖添香的美丽女子,孤独苦学的他,其实早已渴盼良久。

此后绿衣女无夕不至,与书生饮酒,赏诗,并解音律。书生果然是她的知音,听出她必有常人不能企及之歌声,于是恳请她唱一曲销魂。绿衣女怕外人闻去,犹豫不肯,但却经不住书生再三恳求,答应只轻声歌唱。

她的歌声,果真是婉转滑烈,动耳摇心。不只销了书生的魂,亦让她看清了自己那颗深深嵌入了红尘的心。她唱:"树上乌臼鸟,赚奴中夜散。不怨绣鞋湿,只恐郎无伴。"这词里唱出的微凉心境,怕书生并不能完全懂得。否则,不会在她惶恐有人窥视,绕屋周视时,问她为何疑惧如此之深。而当她忧虑此段缘分即将止住时,他又问为何。及至她说,自己心动,或许在人间的时光不会长久时,他又以常理推论安慰,心动眼跳,是人之常事。他终究只是一介书生,没有此灵异女子对世情一眼望穿的颖慧,所以她用歌声告诉他。而他,却始终不能解其深情,更不能明白,她在死亡的危险逼近之时,心内有怎样的惊惧和哀伤。

她知道有大难将至,所以夜半起身、开门离去之时,犹豫徘徊,终于还是返身,乞求书生送她出门。微光之下,此时她脸上的表情,半是忧惧,半是不舍,不知此一别,是不是再不能与君相见。当书生将她送到门外,她又乞求,让他停住,注视她转过房廊,再返身回去。在他,这似乎只是与平素黎明将至时的离去毫无二致的告别;在她,这却有生离死别的大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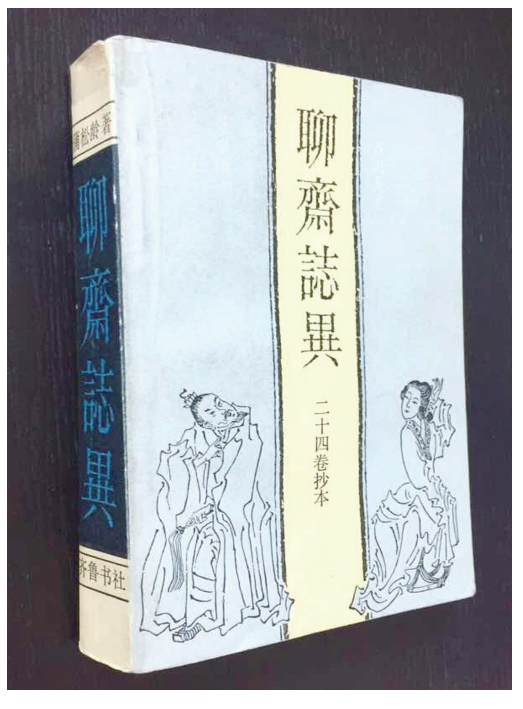
果然,在书生正要归去入寝之时,有女子急呼救命的声音。他急忙奔去,却并不见人影,循声望去,竟在屋檐之下,看到一只硕大的蜘蛛,正死死缠住一只哀鸣的绿蜂。等到书生挑破蛛网,去掉捆缚,发现绿蜂已经奄奄一息。

书生将其置于案头,过了许久,绿蜂才慢慢苏醒,开始移步。也就是此时,她用尽平生之力气,跳入书生的砚池,用满身饱蘸的墨汁,在案几上,无声无息地,缓缓写下一个"谢"字。而后,振动翼翅,穿窗而去,自此遂绝。

这最后的一段,不知蒲松龄写下的时候,心内有怎样的撕心裂肺,万念俱灰。可他还是放它飞去,彻底了断了这份情缘,将挥之不去的伤痛,留给那自此也失去了踪迹的书生,还有如我等穿越时光试图找寻这绿衣女子前世今生的后人。

这只是聊斋里众多痴情女子中的一个,比起那些名姓皆俱、为所爱之人奔走劳碌的鬼狐女子,她几乎会被忘记。可是她的忧伤、惶恐、惧怕、不舍,却又如此鲜明,且打动人心。假若她不是生为绿蜂,那一定是江南妩媚妖娆又惹人怜爱的女子,只那不盈一掬的细腰,便可迷倒多少渴盼红粉佳人的男人。

可她却不过是一只弱小的绿蜂,无力逃掉世间灾难,更不能拯救书生的孤独。所以她与他,也唯有此段夜间相伴而歌的缘分,并用一个"谢"字,做最后生死别离的倾诉。



▲读者感悟

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

饶翔

文艺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在创作者面前,批评家必须保持不卑不亢的对话姿态,坦率陈述自己的真实判断。批评从根本上是基于对创作者的爱护与善意,是为了促使其不断进步,帮助其攀登文艺高峰。

俄国19世纪大批评家别林斯基的行为最好地诠释了文艺批评所应有的爱憎分明的态度和敢于批评的勇气。当年,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破裂友情,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尊严和价值。

批评家和文艺家之间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他说,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批评家和文艺家应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彼此成就。

陕西文坛之所以能经典辈出、一直雄踞中国当代文学重镇,与其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相互砥砺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的陕西文学,创作的力量十分强劲。由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等人构成的创作主力,不仅引领着陕西的文学创作蓬勃发展,而且也在全国的文学创作领域位于前列。在这背后,文学评论所起的作用绝对不可低估,特别是评论家胡采卓有成效的辛勤劳作。胡采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年轻的朋友》、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等作品发表不久,就及时撰写专题评论文章予以热情推介。他还在《从生活到艺术》《从作家的生活创作道路谈起》等理论文章中,把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等人的创作上升到理论层面,从作家"生活道路"与"艺术成就"内在关联的角度,对他们各自取得的突出艺术成就予以深度解读。

文艺批评与文艺创作是相互影响的。文艺批评的活跃,很大程度上源于文艺创作的繁盛,而文艺批评的不断介入,既促进了文艺创作,又演练了批评自身,使得创作与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彼此借力,相互砥砺,从而实现文艺的不断向前与健康发展。 **(据《光明日报》)**

▲新书赏析

北宋时代的缩影,士人精神的注脚

——读夏坚勇长篇散文《庆历四年秋》

禾刀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作为千古名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早就为许多国人所熟记,尤其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更成至理名言,也是千百年来士人的精神坐标。

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继推出《大运河传》和《绍兴十二年》后,以庆历四年(1044)为时间切片,以庆历新政为时代背景,通过对社会生活的日常性展示和细节描画,"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现场,追逐当事人的心路历程",创作出版了长篇散文《庆历四年秋》(译林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庆历四年当然不只诞生了一篇《岳阳楼记》。从时间上看,这一年,"自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已经八十四年,而距靖康之难北宋覆亡还有八十三年,也就是说,在北宋王朝的历史上,这一年恰好处在中点上"。这一年,困扰宋仁宗十多年的西夏与北辽的"边患"终得和解。不过,曾经风生水起的庆历新政因为"外忧"暂时的消除而丧失了动力,改革派被悉数贬出京城。改革的失败,反倒激发士人们在文字中寻找抒发雄心壮志的灵感,居然"成就了中国散文史上一座小小的高峰,一批因参与支持新政而被贬黜的文人士大夫虽然星散四方,却以他们在文学上的建树而星光灿烂"。

夏坚勇以庆历四年秋季底层官僚苏舜钦等人的一次寻常聚会为切入点,又以这波人在官场的"灰飞烟灭"为结局。要说,在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中,这起事件根本拎不上台面。但就是这个小小的引子,不仅回答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宿命",同时也让人性的阴暗昭然若揭。

相较于历代帝王的喜怒无常,宋仁宗算得上是"宅心仁厚"。他谨遵宋太祖"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留下不少善待朝臣乃至侍从的佳话。有人喜欢在"贵"字上做文章,而一手遮天的宋仁宗,却刻意淡化这个"贵"字。虽贵为天子,他却是历史上有名的节俭皇帝,节俭二字贯穿了他的衣着、出行还有饮食。当他听说一枚蛤蜊千钱,"就不肯再吃了"。这些细节,如小说笔触丰富细腻,人物个性形象更加鲜活,历史恍若眼前。

历史是一个画板,任何自以为高明的小聪明,都会被一一记录在案。在本书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代文豪欧阳修的连襟、诗才造诣同样不薄的王拱辰,"借故劾逐王益柔、苏舜钦以倾范仲淹",结果"为公议所薄",在历史上落得千古骂名。不过,王拱辰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一坏透顶。史书载他曾"数论事,颇强直"。王拱辰对新政极尽攻讦之能事,并不代表他对新政深恶痛绝,事实上,"就新政而言,王拱辰其实并不反对,但他现在反感搞新政的那一拨人,那一拨人因新政而风头大劲,挤占了自己上升的通道"。说白了,不是新政不好,而是胸中熊熊燃烧的妒火使然。

忌妒,总是官场的大忌。历史无法假设,王拱辰的"成功"除了佐证其人格分裂外,再就是为宋仁宗的骑墙帝王之术及时输送了弹药。其实,改革派与保守派并不是后世所想象的那样有着"泾渭分明的分野"。在夏坚勇看来,这两个看似针尖对麦芒的官僚群体之间的矛盾,有一部分源于人与人之间心理、性格、官场利益的摩擦。

封建官场就像是人性的考场。士人在这里施展宏图抱负,自私自利者则努力钻营,甚至极尽构陷之能事。不过,人无圣贤,许多时候,人性也并非非白即黑的二元色彩,更多时候表现出像王拱辰这样的复杂性。当所有人的人性在官场同场"竞技"时,那些原本被深深隐藏的人性基因,极可能因为外在利益被激活。这些被激活的人性基因究竟是表现出为人称道的士人精神,还是在妒火中滑向居心叵测的人性深渊,既取决于个人的内在修养,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开的外在约束机制。